

章太炎手稿用纸

陈汉玉

章太炎是近代著名革命家、大学者、书法家，传世手稿数量很多，其中一些未发表过，一些虽曾发表却已失传，一些虽未失传却有多个未发表版本，很具研究价值。但这些手稿散在各处，许多不署时间、地点，甚至不署姓名，不便研究使用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章太炎手稿一百余种，时间涵盖其一生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——流亡日本时期和幽禁北京时期。前一时期他挥动如椽巨笔，与清政府战，与保皇党战，与投机派战，俨然革命阵营的中坚；后一时期他深入虎穴，匹马单枪，宁死不屈，成为南北维护共和、反对帝制力量的精神领袖。两个时期都是章写作的高峰时期，具有典型意义。这批手稿的版本特征很丰富，囊括了章使用过的各种文体、字体，在格式、纸张、装帧上五花八门，各具特色，尤其难得的是，近一半篇目同时具备两种版本，为其版本特征的归纳提供了大量可依据参数。

按照习惯，作者同时期的手稿往往使用同种纸张，根据该纸的流通时间和地点，大致可以推定其写作时间和地点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如有钱人可以制作一批专用稿纸一生使用，这种稿纸的时、地特征均不明显，但章太炎十分清贫，大半生在四处奔波，除晚年外，不具备制作专用稿纸的条件。他的稿纸一般都是随手拈来，又随手“丢去”，烙有较深的时、地痕迹。因此，归纳出章太炎各时期手稿用纸情况，结合其他版本特征，就可作为鉴定其手稿制作时、地的一个依据。

笔者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，有机会接触手稿原件，经研究比对，就章太炎手稿用纸略做叙述。

一、流亡日本时期（1906.6—1911.11）用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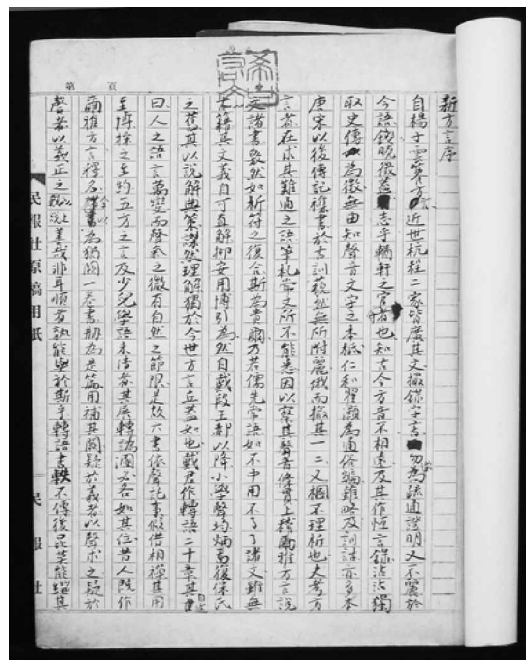
章太炎 1906 年 6 月底上海出狱后，即被同盟会接往日本，1911 年闻辛亥革命胜利，于年底回国，流亡日本约 5 年半。其间 1906 年 7 月至 1908 年底，担任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的主笔兼发行人。1906 年夏、秋之后开始讲学。1910 年开始，担任光复会会长。流亡日本时期，章太炎的经济来源应是同盟会经费、光复会经费和个人稿费。经费断绝时偶尔靠学生资助。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，未见有私人专用稿纸，所用纸张除机关用纸外，基本应是市面流通的纸张。

陈汉玉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。

1、民报社专用稿纸

这是一种黑格大稿纸，长44厘米，高30厘米，半叶13行，行32字，单鱼尾，四周双边，行间有距，版心上镌“民报社原稿用纸”，下镌“民报社”。纸有帘纹，应为手工纸。使用这种纸张的手稿有3231号《新方言》、3292号《初步梵文典序》等。

章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在日本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的主笔兼发行人；《新方言》和《初步梵文典序》均始作于1907年；《新方言》封面有章亲笔题字：“新方言，此乃原稿，阅之可得前后页数。阅后即归还，幸弗拆散。”《初步梵文典序》根据笔迹及内容，可判断为初稿。因此，这两件手稿均写于日本，写作时间前者可定为1907—1908年，后者可定为1907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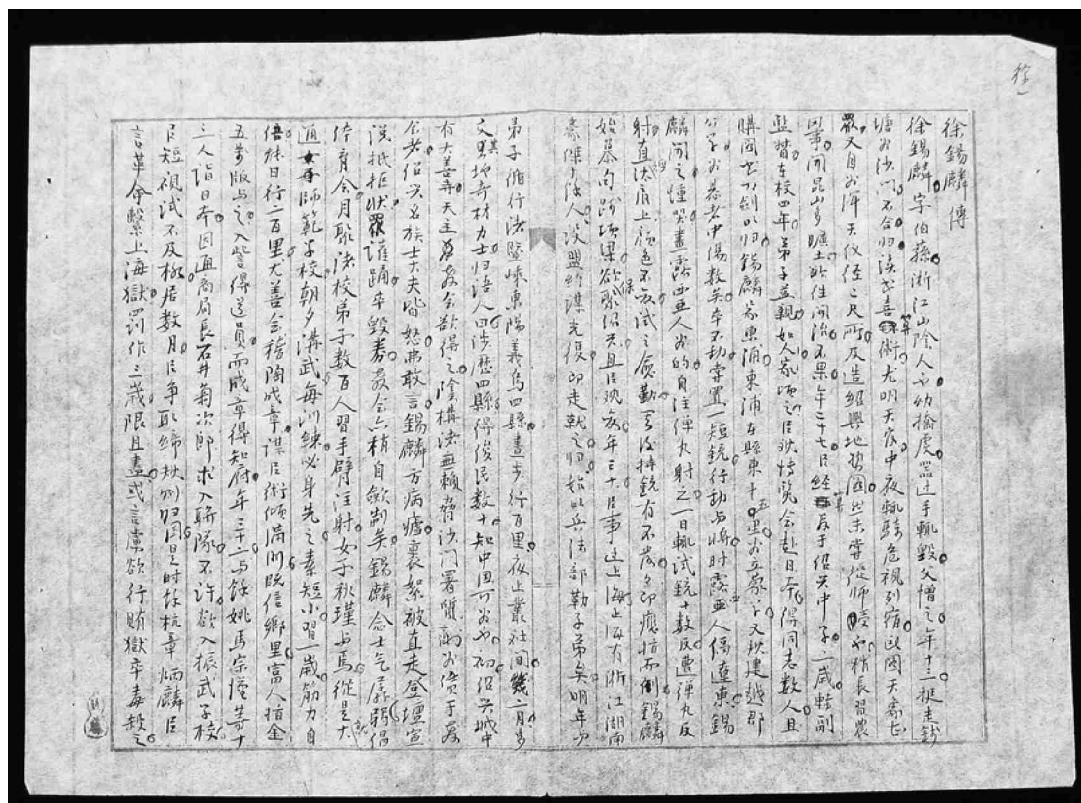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新方言》

2、近藤造稿纸

这是一种8开的蓝格稿纸，半叶12行，四周双边，单鱼尾，框外左下镌小葫芦图案，内有“近藤”二字。纸为机制纸。使用这种稿纸的有3232号《驳皮锡瑞三书》，3241—45号《原道》、《原学》、《原儒》、《原法》、《原名》，3306号《制币》，3321号《徐锡麟传》等。

近藤是日本姓氏；《驳皮锡瑞三书》始出版于1910年；《原道》、《原学》、《原儒》、《原名》始作年代不同，但都曾收入1910年出版的《国故论衡》，这4篇不是原稿，而是抄录后的修改稿；《徐锡麟传》始作于1907年，1914年在《甲寅杂志》发表时改为《徐锡麟、陈伯年、马宗汉传》，本件使用原名，应是初稿。因此，这几件手稿的写作地都是日本，写作时间应在1907—1910年之间，1909—1910的可能性最大，不会晚于1911年。



《徐锡麟传》

3、齿孔纸

这是一种高 20 厘米、宽可任意的有齿孔素纸，齿孔间距 1.5 厘米，起竖格作用，并可按需要扯成任意宽窄的纸幅。纸是手工绵纸。使用这种稿纸的有 3249—3252 号《孙诒让传》、《俞先生传》、《与黄侃书》、《蕲黄母铭》，3324 号《总同盟罢工论序》。

这种纸张的帘纹和风格均不同于中国产品。《孙诒让传》、《俞先生传》、《与黄侃书》、《蕲黄母铭》等始发表于 1908 年，《总同盟罢工论序》始发表于 1907 年。根据笔迹及内容，前 4 篇应是初稿。因此，以上各篇应写于 1907—1908 年。

4. 葫芦图案稿纸

这是一种 8 开蓝格稿纸，很别致。半叶 10 行，行 20 格，有横格，单鱼尾，四周有较宽的单边，鱼尾下二分之一处有一圆圈，框外右下镌“十行廿字”，其下有一小葫芦图形，中镌草书 2 字（未释出）。纸是手工皮纸。使用这种稿纸的有 3259 号《说门》。这种稿纸帘纹比国产纸宽，风格也不同于国产。《说门》始作于 1904 年，1910 年曾加修订。本件手稿改动较多，应为修订稿，因此，其写作时间在 1906 至 1910 年间。

5、微黄 8 开素纸

这是一种颜色微黄的素纸，纸质较糙。使用这种纸张的基本是散页单篇手稿，如 3253

号《与刘揆一书》，3257号《无政府主义序》，3258号《与王鹤鸣书》，3260-3282号《古今音损益说》、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》、《古双声说》、《邹容传》、《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》、《张苍水集后序》等，共几十种。

这种纸没有横向帘纹，不似国产手工纸。上述各篇字体、风格相同，均行书或行草，都是抄录后又加修改的修订稿；除《与刘揆一书》发表于1908年初外，其余均发表于1908年前；各篇都曾列入1908年初章太炎所编《太炎集目录》，篇名后都用括号补注干支纪年，如《读郭象论嵇绍文（辛丑）》，因此，均应制作于《太炎集目录》编制之前，应是章1908年为编辑《太炎集》整理的底稿。又《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》在1908年底至1909年初章修改《太炎集》目录时，被改为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》，而此篇尚未改名，因此，这些手稿都写作于日本，时间应在1908年底之前。

6、8开素纸

这是一种混料手工素纸。使用这种纸张的手稿也是一批散页单篇：3233号《辨诗》，3234号《理惑论》，3236-3238号《小学略说》、《正赍送》等，3240号《明解故（上，下）》，3248号《绿衣答问》，3256号《国粹学报祝辞》，3285-3291号的《思乡原（上，下）》、《信史（上，下）》、《封建考》、《秦献记》等，共约15种。这种纸工艺不似国产纸；各篇字体、风格基本相同，均行书或行草，都是抄录后又加修订的手稿；各篇排列相对集中，多数始发表于1910年，因此，以上各篇都写于日本，时间在1907—1910年间，不应晚于1910年。

7、有眉批栏稿纸

这是一种8开蓝格稿纸，半叶12行，四周双边，单鱼尾，上部有可作眉批的宽横栏。使用这种稿纸的有3235号《辨性（上，下）》、3239号《明见》。

《辨性（上，下）》、《明见》始发表于1910年；它们与使用8开混料手工素纸的《辨诗》、《理惑论》、《小学略说》等6种排列在一起，而且字体、风格一致，应写作于日本，时间在1909—1910年。

二、民国初年（1911年底-1916年夏）用纸

1911年底章太炎从日本回国。此后两年间，奔波于南北（主要是上海、北京），呼吁实现共和政治，并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、统一党理事、总理、共和党理事、东三省筹边使等。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，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。

幽禁北京之前，章的经济来源应靠党内经费和党内经费、友人赠款、个人稿费、政府津贴等；幽禁之初用个人钱款，后来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钱。这一时期章的生活和收入都不稳定，手稿用纸主要是市面流通的纸张；是否有机关用纸不大清楚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民国之后，章太炎手稿用纸有了新的情况：民国初年，章太炎不但是革命元勋，而且文名天下第一，号称“四百州仅存之硕果”，上至军、政界要人及社会名流，下至各会党一般成员，无不把其墨迹奉为至宝，走到哪里，都是求文求字者络绎不绝。既是求文求字，一般都自带纸张，因此，辛亥之后的章太炎手稿用纸种类繁多，虽然如此，这些纸张还是能够打上时代、地区的烙印，可以归纳出一定的特点。

1、红 8 行、红 6 行信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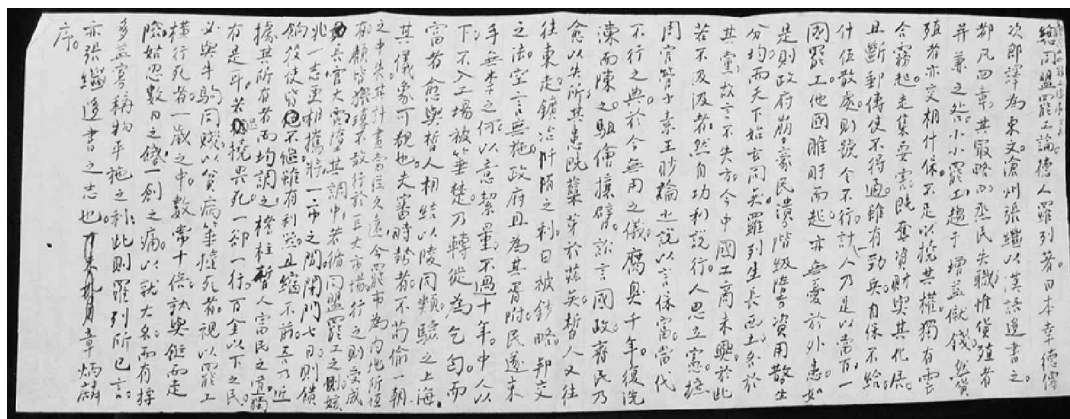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种没有边框的竖幅信笺，用红色（或粉红色）竖线隔成 8 或 6 行，应是当时通用的一种老式信笺。使用这种信笺的有 3310 号《致叶德辉书》（宽 11.5 厘米，高 21.5 厘米）、3332 号《章氏残稿》中的“清氏失政而孙黎有之（宽 12.5 厘米，高 22.5 厘米）”等 5 种，3319 号《致顺天时报记者新闻一则》中的《呈国务卿、各部总长文》（宽 17.5 厘米，高 25.5 厘米），3587 号《致大总统、副总统的信》中的《致副总统的信》（粉红格，宽 12.5 厘米，高 22 厘米）。这些信笺虽然风格相同，但纸质、墨色、尺寸不尽相同，显然不是一次买来。

这批信件的写作地点都是北京。除《致副总统的信》可能写于 1912 年夏秋外，其他都写于 1913 年秋—1916 年夏幽禁北京期间。可以推定，使用这种信笺的手稿都应写于国内，而且有可能都写于北京。1916 年夏天之后，章极少来北方，笔者所见章后期的手稿中，也没有使用这种信笺的。

2、绿花边信笺、

这两种信笺均宽 14 厘米，高 21 厘米。绿花边信笺又分两种。一种框外上镌“雅新信笺”，右镌“第 页”，左镌“中华民国 年 月”，使用这种信笺的有 3317 号《章太炎书札》中的《致商务印书馆书》。另一种四框分别由梅、菊、兰、竹四种花边构成，使用这种信笺的有上述《章太炎书札》中的《补购书籍价目》，3319 号《致顺天时报记者新闻一则》中的《索欠函》。粉花边信笺四周有框，中心有荷花图案，使用这种信笺的有上述《章太炎书札》中的《致黄侃书》、《致朱希祖书》等。

这几封信都写于被幽禁的 1914—1915 年间，可能是托人从市面上买来的流行信笺，所托之人可能是那些充当仆役的特务。笔者以为，如果章太炎自己去买，或托他的学生购买，应该更喜欢那些红八行或红六行。



《总同盟罢工论》

3、各种手裁素纸

章太炎幽禁北京期间的手稿，很多用手裁素宣纸写成，一般 26-28 厘米高，宽窄不一。可能使用时先把全开素宣裁成 26—28 厘米高的横幅，再根据需要决定宽窄。这些手稿中，文稿多用行书或行草写成，书法作品多是诗文，用小篆或隶书写成。

文稿中 3298《近思》、3299《亡征》、3301《官说（上）》、3303《二宋》、3304《惩败》、3305《争教》、3308《非所宜言》等是薄白宣，宽 60 厘米；3300《道本》、3302《唐学》、3307《伸桓》、3309《非禅让》等是薄黄宣，宽 78 厘米；两种纸的宽度都是全开纸的幅宽。凡使用相同纸张而且笔迹、风格相同的基本都可推定为 1914 年左右的手稿。

书法作品的用纸不但大小不一，质料、厚度、颜色也很不一致，3318《章太炎墨迹》中有许多这种手稿。据载，章太炎幽禁北京期间，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时，“醉则怒骂……骂倦则作书自遣，大篆、小楷、行草，堆置案头，日若干纸，党中侪辈欲得其书者，则令购宣纸易之”；移居钱粮胡同后，仍经常书写不断，愤慨到极点时，甚至书写大字“速死”挂在屋中。这些书法作品的用纸来路不同，因此极不一致，没有特征可言，只能从内容、字体及其他方面判断其制作时间。

国家图书馆所藏章太炎手稿数量上可居前列，版本特征又很丰富，在此基础上归纳的用纸特点，自然数据更准确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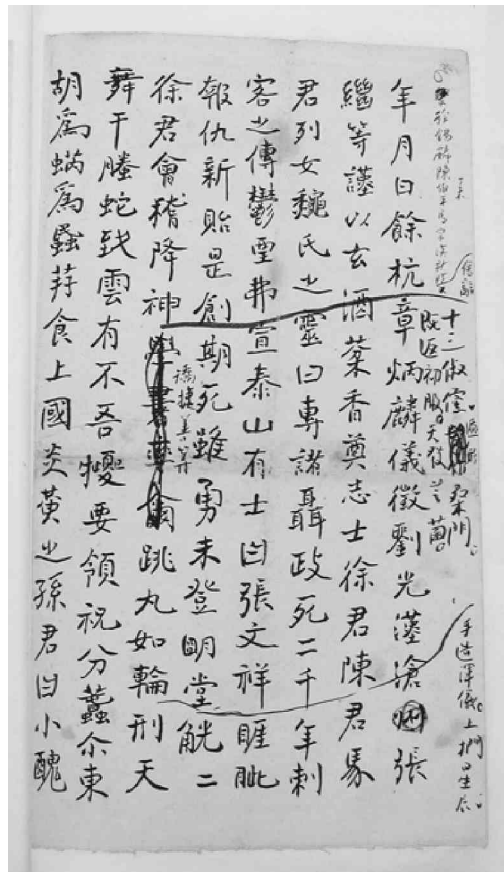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特点不但可作鉴定新发现手稿的依据，还可纠正一些以往的误断。比如，1986 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》，未标尺寸和纸张质地，但从影印的纸张形态、字迹和内容上，就可看出一些时间判断上的失误，如：该书所选《新方言》，著录为 1907 年，明显有误。

在本文第一節第一類稿紙中，曾介紹國家圖書館所藏《新方言》手稿，它使用時、地性極強的民報社專用稿紙，封面又有章親筆題記說明是原稿，寫作時間無疑可定為 1907—1908 年。而《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迹選》中的《新方言》手稿，內容已比國家圖書館《新方言》原稿增刪了許多，顯然時間靠後，不能定為 1907 年。《莫錫麟等文》

這件寫作稍晚的《新方言》手稿，可以先根據內容確定其版次，再尋找使用相同紅格稿紙的手稿研究對比，才能確定其具體寫作時間。

又如，該書所選《征信論（上，下）》，著錄為 1901 年，明顯有誤。

國家圖書館所藏章太炎手稿中，也有兩個不同版本的《征信論》，一個是 3279《征信論（辛丑）》，第二個是 3315《章氏文集》第 1 冊中的第 4 篇《征信論》。前者題“辛丑”，只能說明《征信論》初撰於辛丑年即 1901 年，而不能說明這件手



《莫錫麟等文》

稿是寫於 1901 年，因為與它一同保留下來的，還有第一節第五類稿紙中介紹的其他約 30 件手稿，都是為編輯《太炎集》而抄錄修改的底稿，寫作時間應在 1908 年左右。後者比前者更晚，是先抄錄前者後，又加以修改的再整理稿。

《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迹選》中的《征信論（上，下）》比國家圖書館的兩個版本又晚，其中《征信論（上）》是上述第二個版本的抄錄稿，《征信論（下）》則是全新的內容。根據內容比較，這個《征信論（上，下）》不但不是 1901 年的手稿，而且不會早於 1908 年；根據它的用紙推測，它與第一節第六類稿紙中 3291《秦獻記》等一批使用 8 開混料手工素紙的手稿在用紙、字跡等方面相近，有可能寫於 1910 年。

在版本學中，用紙的研究是一個重要方面，但作為圖書的一種特殊形式，手稿由於數量和版次上的限制，似乎很少有人由此入手進行探討。筆者認為，對章太炎和類似情況的作者——其手稿數量多，流傳廣，著錄不全（無時、地記錄及署名），需要鑑定者多，有必要進行手稿版本的研究。這種研究可以從用紙入手，也可因人而異，從筆體、格式、裝幀等方面入手。由於涉足者少，目前無章可循。